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十六】

八闽侨心故园

福建归侨口述录

主 编◎林明江

副主编◎林晓东

本书是由52名福建杰出归侨代表口述历史资料编辑整理而成的。该书记录了52名归侨侨眷不平凡的人生际遇，他们中既有纵横捭阖的抗日英雄，也有堪称楷模的省级领导；既有学术上有杰出成就的院士，也有在商业领域成就斐然的民营企业家；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全国劳模和“三八红旗手”……他们虽然大多已经退休，但有的仍然老骥伏枥，奋战在科研岗位上，有的还在为地方的社会文化事业出谋划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八闽侨心系故园

——福建归侨口述录

主 编 林明江

副主编 林晓东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闽侨心系故园：福建归侨口述录/林明江，林晓东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5034 - 2330 - 7

I. 八… II. ①林…②林… III. 归国华侨—生平事迹—福建省 IV. K828.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5017 号

责任编辑：曾小丹 胡福星 陈永升 封面设计：宋晓亮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装：北京凯通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0024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开

印 张：19.25 字数：4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中国是一个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生计、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居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侨华人关心着祖（籍）国的强盛与进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展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华侨华人团结互助、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有利于了解他们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成就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为祖（籍）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史；而且更有利于我国总结开展侨务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了解华侨华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侨务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提供参考和借鉴，更有针对性地为华侨华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以推进侨务工作的向前发展。

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就国外而言，华侨华人问题作为一个与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相关的移民问题，于20世纪初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密切往来，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和相互的联系，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而成为热点研究的问题。就国内而言，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发展、繁荣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体现了四个特点：一是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年轻一代专家学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崭露头角，为研究带来兴旺的景象；二是新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协作更加密切；三是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文章和著作数量繁多，研究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四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注重现实侨情的研究，而且广泛涉及到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人口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研究的趋势。

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在历任学会领导和历届侨联负责同志、侨界前辈、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下，学会的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进展，不仅发挥了全国性侨史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协调的龙头作用，而且推进了地方历史学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资料收集、研究编撰、著书立说等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较好地发挥了侨史研究“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21世纪以来，随着华侨华人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华侨华人的研究。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旨在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供展示研究成果的阵地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采访老归侨，整理、出版老归侨口述历史是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2004年开展的一项重要规划，这项规划得到了中国

侨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截至目前，已先后到天津、山西、广西、海南、广东、福建等六个省市进行了采访。福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海外侨胞与归侨侨眷众多，《八闽侨心系故园——福建归侨口述录》一书是由52名福建杰出归侨代表口述历史资料编辑整理而成的。该书记录了52名归侨侨眷不平凡的人生际遇，他们中既有纵横辟阖的抗日英雄，也有堪称楷模的省级领导；既有在学术上成就卓著的院士，也有在商业领域成绩斐然的民营企业家；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全国劳模和“三八红旗手”……他们虽然大多已经退休，但有的仍然老骥伏枥，奋战在科研岗位上，有的还在为地方的社会文化事业出谋划策。为此，我们将本书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十六》出版。

在此，我衷心希望：《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的问世，有利于将华侨华人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林明江

2008年10月

目 录

序	/	1
为侨做事 无怨无悔	贝仲敏 口述 /	1
能文能武 任劳任怨	蔡惠仁 口述 /	13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蔡启瑞 口述 /	21
世界上最怕“认真”两字	蔡新生 口述 /	32
不计名利干革命 侨务对台做在先	蔡仲谋 口述 /	43
漂洋过海 祖国是我家	陈杰庄 口述 /	50
平凡的工作 默默的奉献	陈琼英 口述 /	62
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	陈秋风 口述 /	73
以义取利 富而成仁	陈瑞凤 口述 /	86
“祖国在我心中,我在祖国怀里”	陈宣权 口述 /	95
无愧的人生	邓荣翔 口述 /	111
一切归功于党的培养	冯玉兰 口述 /	124
回忆我的父亲郭瑞人	郭姗姗 口述 /	133

我的蓝色海洋之梦	洪华生	口述 / 146
不屈的脊梁	洪民强	口述 / 161
往事如烟 岁月如歌	洪世伍	口述 / 173
风雨人生路	胡鼎山	口述 / 191
为侨服务 终身不悔	黄广坦	口述 / 201
坎坷半生只为真	黄国明	口述 / 211
甘为平凡做人师	黄吉平	口述 / 228
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南侨机工	黄炎宋	口述 / 236
一心一意跟党走 尽心尽力为侨务	黄引辉	口述 / 244
用光去照亮别人	赖爱光	口述 / 250
努力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蓝健人	口述 / 261
乐育英才写春秋	李贤起	口述 / 269
我在侨联义务劳动了七年	梁逸群	口述 / 277
不问饥寒抗风雨 甘为百姓献残骸	刘光	口述 / 294
愿做中华好儿郎	刘瑞国	口述 / 305
黄长溪主任永远是我工作生活的楷模	卢仁辉	口述 / 313
心理咨询:让心灵洒满阳光	罗杞秀	口述 / 328
心系祖国 真诚奉献	邱觉民	口述 / 339
斗争中,我逐步成长	施瑛	口述 / 350
只有不懈努力才会尝到收获的快乐	谭万超	口述 / 365
一生从教,著书育人	汪慕恒	口述 / 376
理想闪耀我心中	王汉杰	口述 / 386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王今生	口述 / 402
我的催化人生	魏可镁	口述 / 412

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	吴文华	口述 / 425
晚霞如醉共擎觞	吴逸汉	口述 / 437
我的愿望是要当一名老师	肖国才	口述 / 448
坎坷不平人生路	谢培养	口述 / 458
无悔的革命岁月	许集美	口述 / 470
一切交由母亲安排	尤宗祥	口述 / 480
难忘父兄的教诲	于苓惠	口述 / 500
在追求进步中成长	曾淑萍	口述 / 509
父亲的起名注定了我忙碌的一生	张 罗	口述 / 519
祖国强盛,是我的最大心愿	张省民	口述 / 533
宁可饿死唐山 不做异乡番人	张元珍	口述 / 545
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张振民	口述 / 553
历尽磨炼 自强不息	郑万英	口述 / 562
苦,但精神愉快	朱开勋	口述 / 579
做海外华侨华人工作要以情感人	庄南芳	口述 / 587
后 记		/ 598

为侨做事 无怨无悔

——贝仲敏 口述

被采访者简介：贝仲敏，男，1938年10月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邦戛市。1944年进入当地华侨学校读书。1955年7月于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1958年7月回母校邦戛中华学校任理化教员。



贝仲敏近照

1960年2月，邦戛遭遇大火，在中国驻印尼总领馆的指导下，全身心投入到救灾遣侨工作中，以总组长的身份率领邦戛第四批灾侨959人乘接侨船“福英”号归国。同年由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考取福建第二师范学校，9月至双弟华侨农场协助平息第三批归难侨的思想波动，后留在该农场当小学教师。1984年5月调到福建省侨联宣传联络部工作，1998年10月退休。现任福建省华侨摄影学会秘书长。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27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福州市被采访者住所

采访者：黄玉琼 陈永升 胡修雷 陈小云 陈卓

整理者：陈小云

一

我1938年10月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邦戛（PE-MANGKAT），祖父和父亲先后从广东揭西出去的，我算是第二代华侨，若从我母亲这边来算，从外祖父的祖父算起，已经是第五代了，如果从祖母那边来算，就更讲不清是第几代了。

1931年，祖父和父亲因为家庭太贫困了，迫不得已才出国到印尼谋生，父亲当时14岁，那个时候是荷兰殖民时期。他们到印尼山口洋后，由于没什么手艺，只能去乡下给人种植，就是给先到达的华人种胡椒，不久祖父病死了，父亲就开始了一个人打拼的生活。

1944年，我进入当地华侨学校读书。1955年7月年到雅加达“巴城中学”读高中，1958年7月回母校邦戛中华学校任理化教员。那边用的教科书和祖国大陆是一样的。

邦戛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第三大城市，又是仅次于首府坤甸的第二大海港商埠。华人在那里的历史悠久，且人数很多。据1960年我向邦戛副警长了解，邦戛全区（相当我省的乡镇）有6万人口，华人约占2/5，埠内人口不到2万，华人占过半。除华人外，印尼人中有马来、马都拉、大雅、万越、布吉等族群，另有极少数的荷兰人（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神甫、修女——做医务工作）是多元民族的社会，尽管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各异，虽杂居城乡，尚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居住在乡下的华人都是以务农为生——种植椰子、橡胶、胡椒等经济作物和水稻、蔬菜、饲养禽畜，少部分经营乡间的零售小商活动。而在邦戛埠的华人都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城镇的商业活动几乎全是华人运作。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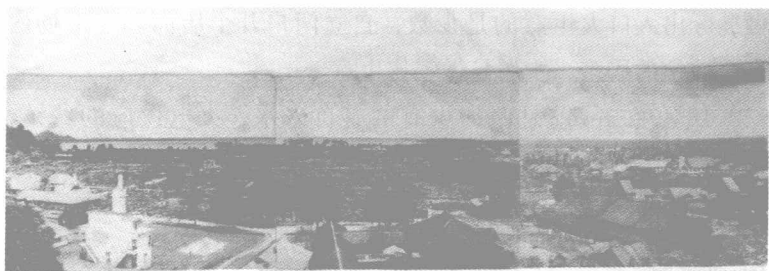
做岛际出入口大生意的是少数，自立门户开个店面和在市场内有个摊位的居多，主要是做零售生意。

邦戛在二战前是西加少有的有自来水、火电供应的城镇，（首府坤甸 50 年代中才建有自来水厂，管辖邦戛的三发县城直到 60 年代才通电）地处三发河口，500 ~ 1000 吨货轮可进出停泊，陆路交通便利，成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不管是稻米、土特产还是海产都十分丰富；市政设施完整，医院，中药店，邮电局，电影院（2 座），应有尽有，是较现代化的城镇。

华侨社会自成体系，二战前就有以地缘结合的长生社、同群互助社（均为客属）、仁和社（潮州人）、琼崖社（海南人）及闽侨商会等社团，二战后统合成中华公会，是当地政府管理华侨的中介机构，有处理华侨间的民事纠纷的职权。在其领导下，华侨教育事业更是蓬勃发展，50 年代鼎盛时有一所中学，小学设有 4 个分校，还有“印华学校”（荷兰殖民时期称荷华学校，95% 是信奉天主教和亲台华侨的子弟）。凡有华侨聚居的乡村都建有初小或完小，至今还能叫出名称的多达 30 多个。此外，还有文体组织，如篮球队、足球队、音乐队、合唱团、歌剧社、职工和妇女夜校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另外，随先辈“过番到南洋”的各路神仙也在此“安家落户”，为老一代华侨的精神寄托处。尤让人甚感亲切温馨的是华夏文化、传统习俗传承得十分完好，真可谓是个“华人世界”。因此，有“邦戛窟，得落唔得出”之美誉（容易找生活的好地方，进得去就出不来）。

二

1960 年 2 月 2 日，我生长的地方——邦戛遭遇大火，8000 多侨胞顿成灾民，随后祖国派接侨船接回 3500 多位灾侨。我亲



1960年，邦戛火灾后的景象

身经历了这场灾变，并参加了这场反排华斗争。时至今日，回想当时的景象，记忆犹新：

1960年2月2日，邦戛发生大火，从凌晨1点烧到6点，直至军警强制人们出来救火，火势蔓延到河边、空旷地段才停熄。这次火灾面积波及到市区80%以上（其中华侨的房屋店铺占90%以上），600多间房子，3座大市场（布谔洋杂、肉类蔬菜、海鲜），一座华侨小学，一座电影院，一个警察局，还烧死1个病人。

至于造成大火的原因，是不慎失火或某一方面纵火，至今还是个谜，似乎都不想弄清，只是知道起火点是市中心大街和树仁（胶）街交叉点一乐群咖啡店侧室的绰号叫“大面”的华侨开的小吃店。灾后，店主被警察拘禁，不久就放出来，不了了之。

邦戛遭遇的这场大火，牵动全西加乃至雅加达、泗水等地的华侨。受灾当天早晨，许多邻近的华侨煮了饭菜，买了糕点，带来分发给灾民，无论是亲朋还是互不相识；十分可贵感人。

灾民有的被外地亲友接走，或到没被烧到的人家借个地方

安顿，所有校舍住满了灾民。我的父母和弟妹当天被舅父接到山口洋，旋即我到中华公会参加救灾工作。

中华公会（简称中公）是二战后由各地缘社团统合组成，是当地政府管理华侨的中介机构，有权协调华侨间的民事纠纷，申办政府证件、中国护照，尤其是办华文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驻会人员5位：主席梁启琅，秘书余北河，社会福利股股长张慕平，译员黄其发，庶务员卢志坚。

由于中公委员绝大多数受灾（主席和社会福利股长的家也被烧）都在自顾安顿妻小和自家善后，而广大灾侨犹如嗷嗷待哺的婴儿，聚集到中公，企盼得到救助。我和一批中小学教师、热心人士自动到中公参加救灾工作，受到欢迎和拥戴，商议赈济措施。于是有向米厂借大米，向商家募集救济食物赈济灾民的举措。次日起，各地中公陆续运来救灾物资，中公天天忙于分发给灾侨，灾侨也因此没有一个忍饥挨饿的，社会也安宁稳定。

各地各界侨胞源源不断送来救灾物资，当地军政长官前来中公表示感佩华侨的互济精神。他们提出要分一部分物资赈济印尼灾民（政府却没有能力拨物资救助华侨），我们当时尽管心中不乐意，但还是拨了一批大米、白糖赈济印尼灾民。后来，遣送灾侨工作中得到当地政府很好配合，显然，前述的做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受灾当晚，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复电慰问灾侨，指示要组织起来，全力救助灾民，希望侨胞发挥同舟共济精神，共渡难关。第二天张贴、分发到各处，起到安抚灾侨、平息乱涨价的积极作用。

但当地军事掌权长官则来到中公指责说：“你们没有通过我们核准就贴出中文布告，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上搞独立

王国，是对独立主权国家的挑战，是违法的！”当时我们都有点害怕，还好的是平时这位掌权者与中公的关系不错。余秘书解释说，中公委员都遭遇火灾，损失惨重，救灾工作是灾民自发出来做。他机智地指向我说，这位教师的家也被烧掉了，他希望通过张贴慰问电使大家安定下来，互相救助，这也是在帮政府保持地方安宁。我承认没有将电文译成印尼文、没有通过掌权者批准的错误，请求原谅，保证今后不再犯。好话讲了，“好事”也做了，后来也就没有再追究。倒是从中得出一条经验：救灾的事宜由灾民出面做。

坤甸中公张世成秘书不时转达总领事馆指示，要我们成立救灾委员会，布置救灾和做调查并举的任务（信函加注：“付诸丙丁”，意即看后烧掉）

大概是第四天，救灾工作委员会成立。梁启琅、黄汝雄任正副主任，我被推选当秘书，主要负责与坤甸和山口洋中公联络和调查邦戛华侨受灾情况。为此，我特于2月中旬到坤甸，向中华公会主席林勤海，秘书张世成汇报诸情，接受他们转达领事馆的指示。

约一星期后，赈灾物资较充裕了，就着重做准备遣侨的前期工作。我们心情很急切，希望领事马上来视察并派接侨船来接灾侨（那时中国已经派接侨船到印尼其他地方开始接侨了）他们告诉我要先做好前期工作，回邦戛后发动灾侨签名，掀起要求遣送回中国浪潮，向印尼政府送请愿书，给它施加压力，以期能顺利遣侨。

按指示精神，请愿书由我起草，由黄其发翻译成印尼文，印发15份，分别寄送印尼中央、西加里曼丹省、三发县的军事掌权长官和政、警、移民厅相关部门，同时也寄给中国大使馆、总领事馆。

请愿书的内容是：我们世代为建设繁荣当地作贡献，但我们不幸遭灾了，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我们无法继续居留，瞻前顾后，只有回中国一途，我们要求印尼政府遣送受灾华侨回中国；若无法实现愿望，要求准许中国政府派接侨船到邦戛码头接灾侨；简化一切手续（当时，离境手续很繁杂，填许多申报表，要打60多个手印）；免去一切税务（离境须交外侨税），允许火灾中救出的财物免税放行；要求印尼政府保证我们安全离境，安全回到中国。

接送邦戛灾侨工作由我国驻印尼总领馆毛欣禹领事坐镇坤甸、山口洋亲临指导，第五批则由我驻马辰江燕领事亲临指导。我当时任邦戛“政府遣侨工作委员会”登记股股长。主要负责登记灾侨，回收回国申请表并汇集送交中华公会主席梁启琅先生逐份审批签字，再由“五人评选小组”根据毛领事的指示，评出回国灾侨，公布名单，再由登记股造册，呈毛领事签批归国证明书（当年，归难侨骤增，总领馆将签发护照本改为类似文凭、奖状的“归国证明书”，整批归侨只给几个大组长办证，注明偕同某某人，附上组员简况名册）。第一到第四批回国灾侨名册皆由我登记股经办。

按毛领事指示，每批灾侨都要严密组织好，安排中华公会、或遣委会成员或教师中有组织能力的人任正副总组长。整批分3—4个大组，大组又分若干个小组，安排有责任心且有组织能力的灾侨任大小组长，另设文书、财政、传达、纠察、生活、救护等小组，各司其职，以求安全顺利回到祖国。

每批灾侨提前2—3天集中住宿在山口洋中华小学第一校，生活全由山口洋“遣委会”安排。大件行李从邦戛港通关，人员由山口洋码头通关，而后乘驳船约1小时，送到停泊在山口洋外海的接侨船登船。

五批船都由山口洋起锚，到汕头登岸。

三

1960年4月27日，我们抵达汕头后，我协助中侨委“安置接待工作委员会”将灾侨分配到华侨农场。5月2日，我服从分配到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不久考取了福建第二师范学校。9月，汕头接委和双弟华侨农场以我在国外是教师，又在侨团中做遣侨工作，要我到农场协助做平息归难侨思想波动的工作。于是，我休学到安置邦戛第三批灾侨的双弟华侨农场（父母亲一家也安置在这个农场）。

初到农场，看到学龄前小孩在托儿所“关不住”，建议开设幼儿园，第一个工作就是被安排当单干“幼师”。由于能拉会唱，节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少不了我。1961年被调到农场小学当音乐图画教师，兼任农场体工队（生产队建制）队委，专事每周3个晚上的歌咏活动。1962年调到农场宣教科，具体工作是管理农场图书室、办墙报。1965年起加上管理有线广播站，开广播、当播音员，维修外线、纸盆喇叭。学校和农场的节日文体活动仍当主角。“文革”开始，图书室被红卫兵封闭，专事广播站工作。

1969年“清队”时我被扣上“海外破坏接侨，里通外国”等罪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交农业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经反复申诉，1972年底复查改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解除监督劳动，改到饲料组种菜，重新起用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琴手，并重新管理服装道具、乐器灯光扩音设备等后勤工作。

1978年，我国政府接待安置中南半岛难民，农场重设宣教